

中 / 国 / 传 / 统 / 文 / 化 / 知 / 识 / 小 / 丛 / 书

ZHONGGUO
CHUANTONG
WENHUA
ZHISHIXIAO
CONGSHU

24

东林书院

察举

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



22

-24

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》

东林书院

郑 权

编著

察 举

王凌皓

编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》

编 委 会

主 编	胡维革		
副 主 编	陈立忠	胡晓岩	郝国昆
编 委	(按姓氏笔画排列)		
	于晶娜	田毅鹏	
	厉永平	李书源	
	陈立忠	陈虹妮	
	周玉和	郝国昆	
	胡晓岩	胡维革	
	赵永春	程舒伟	
	雷 庆	颜震华	
	魏克威		
责任编辑	刘慧杰		

前 言

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，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辉煌业绩，包含着华夏先哲的无穷智慧，是先民留给今人的一份极其丰赡、弥足珍贵的宝藏，是人类文化宝库中一朵璀璨的奇葩。今天，如何使这一东方文化瑰宝为当今世界所用，使其为振兴中华、实现四化大业服务，是当代国人学子肩负的神圣责任。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，如何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，接受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，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主义“四有”新人，以肩负起两个文明建设的历史重任，更是时代赋予的宏伟重托。为此，我们编写了这套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》。

这套丛书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具体文化事象立题，共选择100种文化事象，每两种文化事象为一本，共50本。在具体操作上，我们力求内容科学准确，文字潇洒飘逸，风格新颖别致；既注重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，又着眼于现实借鉴和运用；既写清每一种文化事象的来龙去脉、历史沿革、目前状况、文化蕴含，又将与此事有关的传说、故事、诗文、人物等囊括其中；夹叙夹议，文史交融，妙趣横生。总之，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够起到弘扬中华民族精神、传播传统文化知识、宣传典雅、崇高、真善美的作用，对广大读者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。

面对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，我们这套小丛书只能说是在海

边采撷了几个小小的贝壳，远谈不上包罗净尽、解说确当，更不待说尽其精要、毕发奥旨了。为此，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教，以期日后有以改正提高。

编 者

1998年1月1日

目 录

东林书院	(1)
一 书院的起源	(1)
二 书院传习理学	(5)
三 明代书院由衰而兴	(9)
四 天下书院 只知东林	(14)
五 志在世道	(17)
六 东林会约	(21)
七 东林讲会	(23)
八 尊师爱生 自学为主	(29)
九 明末四毁书院	(35)
察举	(40)
一 察举制溯源	(40)
二 察举制的诞生与演进	(53)
三 察举制的科目与内容	(62)
四 察举制的利弊评说	(72)
五 察举制外话选举	(79)

东林书院

明代中叶以后，设立书院之风盛行。在众多的书院中，影响最大的是无锡东林书院。东林书院因与东林党关系密切，在明代荣耀一时，最后成为“党祸”的众矢之的。但东林学派首领人物的刚烈风骨及高风亮节却为后世所景仰，顾宪成的名句“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；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”，更将东林书院当时的盛况传之千古，名闻史册。

一 书院的起源

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，从唐末五代至清末，存在了1300年之久。书院在组织管理形式和教育教学制度、方法等方面，跟官立的太学、郡县学不同，是以私人创办为主，它往往积聚大量的图书，是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一个高等教育机构。书院在办学形式、教育教学的组织管理制度，以及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对我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。

书院的名称始见于唐代，有官方创办和私人设置的两类。不过此时的书院只是官方校书和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，还不是真正的教育机关，只能看作是书院的雏型。

唐代官方设立的书院有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。它们相当于宫廷图书馆，主要职责是刊辑经籍，负责荐举贤才和提出某些建议，供皇帝选用和参考。在《全唐诗》中的一些诗句反映了当时这两所书院的一些活动：

广学开书院，崇儒引席珍。
集贤招袞职，论道命台臣。
礼乐沿今古，文章割旧新。
献酬尊俎列，宾主位班陈。

还有一首诗提到：

侍帝金华讲，千龄道固稀。
位将贤士设，书共学徒归。
……
欲知朝野庆，文教日光辉。

这些诗句反映出唐代官方设立的丽正书院、集贤书院，还不是后来那种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，它除了校刊、收藏经籍之外，只是帮助皇帝了解经典史籍。

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，起源于私人讲学。可以说，书院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。从孔墨私学，经稷下学宫、精舍或精庐，到书院制度，代表着我国私学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典型形态，书

院制度堪称私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形态。

唐代有不少私人创建的书院。起初，多数是将个人读书治学之所称之为书院；后来，逐步发展成聚书建屋、授徒讲学的书院。我们从《全唐诗》和各地的地方史志书中可以看到诸多的书院，如李秘书院、杜中丞书院、费君书院、南溪书院、田将军书院、松州书院（漳州）、石鼓书院（衡阳）、青山书院（寿昌）、明道书院（衡山）、景星书院（九江），等等。这些书院多因地因事命名，有了固定的特有名称，表明书院已成为稳定的教育机构。其中明确记载有讲学活动的书院有四所：皇寮书院、松州书院、义门书院、梧桐书院。这些书院都是由个人读书之所发展为讲学之地的，所以规模都很小、收徒也不多，影响极有限，它们仍以读书为主，讲学为辅。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，起源于庐山国学。庐山国学，又称白鹿国庠，建在江西庐山，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，它是由私人读书治学之所发展为聚徒讲学的书院的典型形态。所以说，虽然在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中聚书授徒的讲学活动还不很普遍，规模也比较小，尚未形成制度，但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已诞生了。

到北宋，有了著名的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，书院便在我国教育事业中占有地位。北宋虽然有了几个出名的书院，但并不发达，书院大盛在南宋，不仅数目大增，而且形成各种学派。全祖望在《鲋埼亭集外篇》中指出，由于金兵南下，嵩阳、睢阳二书院遭到破坏，四大书院只剩下白鹿洞和岳麓。这两个书院因为朱熹和张栻在那里主讲过，声名很大，可是新起的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和陆九渊的象山书院，也与之齐名。他说：“四家之徒遍天下，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。”这里所说的四家之徒，指的就是学派。自宋以后，历元明清，书院不断发展，起了一定的

作用，也有一些不良的影响，到清光绪二十七年（1902年）才废止。

书院，通常也称“精舍”或“精庐”。其实书院与精舍（精庐）开始并不是一回事。精舍（精庐）的名称在先，书院在后。早在东汉时期，就有人称自己讲读的地方为精舍或精庐。在《后汉书·姜肱传》中记载：姜肱与他的弟弟夜行路遇强盗，强盗受到姜肱高尚德行的感召而悔悟，后来到姜肱的精舍，拜姜为师。《后汉书》中对“立精舍教授，远方至者常数百人”的记载很多。“精庐”、“精舍”中的人都是学儒家经书的，也是不愿做官的，他们“立精舍”，即在自己家里或选择比较幽静的地方，盖几间房子，或是自己在那里专心读书，或是聚徒讲学，寻求一种避世隐居的生活。

三国、两晋时代，随着佛教、道教的传布，有些僧侣、道士也把传经授道的地方称作精舍。到了唐代，使用精舍的人更多了。仅从《全唐诗》的诗题中就可以看到近百次。其中多数是僧侣、道士居住或读经说法的地方。如龙泉寺精舍、少林精舍、静林精舍等等。从《全唐诗》中，不仅可以看到“精舍”之名已普遍用于佛、道、儒各家，而且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。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，如吕温、温庭筠、岑参、韦应物、柳宗元、王之涣等，“寻”、“访”某禅师、上人（和尚）和“游”、“过”、“宿”他们的精舍，并写诗赞赏、敬慕僧道；不少禅师道人也与尘世文人结为挚友。所以，书院和精舍（精庐）在唐和唐以前并不相同，还不能说书院即精舍（精庐）。

书院制度自从宋初基本形成，至清末改书院为学堂。在10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，时兴时衰，走着曲折的道路。唐末五

代数 10 年间，政治紊乱，经济萧条，社会不安，读书士子穷居草野，无由显身。宋既统一海内，乱世渐平，文风日起，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，但当时政府尚无暇顾及教育，没有充足的实力兴学设校。书院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兴起的，它既满足了读书人的求学要求，又为统治者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。因此，一批由私人创建的书院便兴盛起来，并且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资助，出现了白鹿洞、岳麓、应天府、石鼓等著名的八大书院。南宋是书院的极盛时期，书院数量之多，规模之大，组织之严密和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。书院在封建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充分显示出来，几乎取代了官学而成为主要教育机关，支配和影响着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。

二 书院传习理学

自汉武帝罢百家，置五经博士以后，传习儒经便成为太学的主要任务。由于通儒经可以做官，开辟了利禄之途，读书人便钻在儒经里。经学大师（包括私学）多到千余人，汉代经学，可谓盛极一时。汉代传习儒经，注重解释经文，有时一两个字的解释，可以达到三万字，所以称为“训诂之学”或“考据之学”，也就是后世所谓的“汉学”。到了宋代，出现了另一种局面，开始这个局面的是程颐、程颢，成熟于朱熹。他们遍注诸经，朱熹更抬高《四书》的地位，写了一部极有影响的《四书集注》。程朱反对汉儒专在字句上作训诂，标榜要研求儒经的“微言大意”。所谓探求微言大意，就是说要用自己对儒经的体会来说出它的精奥。因此，可以离开经文注经，甚至可以删补

章句（如朱熹补大学格物致知传），称为“义理之学”，也就是后世所谓的“宋学”。宋代研究儒经的人很多，北宋王安石，南宋的薛季宣、陈傅良、叶适、陈亮、吕祖谦等都是有名的，不过他们不属于宋学。一般所称的“宋学”是专指“理学”一派，包括明代的理学在内。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。汉代经学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为最有势力，它用“天人感应”说来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地位。魏晋以后这种人格化的天帝，已渐渐不为人们所信，于是有了王弼用“以无为本”的玄学哲理注《易》的事。唐代佛学大盛，大乘各宗，讲本体，讲认识，讲“觉”，讲“悟”，还讲了很多属于哲学范畴的问题，如心与尘（即物）、理与事、一与多、生与灭等，讲得既玄妙，而又有一套修持方法，特别是禅宗的心性修养，更能麻痹劳动人民，因此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护持，儒学相形见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为了对抗释老，使儒学重新获得地位，不能不创一种新儒学——理学。这种新儒学，用属于哲学概念的“理”来代替人格化的天帝，并竭力抬高理的地位，把它说成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或规律。实际上“理”或“天理”就是纲常之道，于是纲常之道便无可逃于天地之间了。同时还另辟一条为汉儒所无而佛学所大讲的修养心性的道路，教人内向用力作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工夫，来发挥纲常之道的作用，使劳动人民甘心情愿接受统治而不反抗。理学由二程开创，到南宋分立门户，朱熹一支主张“理”是超绝的、独立存在的实体，是先天地而生而又派生万事万物的，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。另一支是陆九渊，他主张“心即理”，理在心中，这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。朱陆分立门户，只是入门的方法不同。朱熹主张“道问学”，由格物致知而上通天理，先做读书的下学工夫；陆九渊主

张“尊德性”，要求直指心性，先立其大者，反对搞支离破碎的传注工作。至于扶植纲常的目的，则是一致的，所争只在用哪一种办法能更有效地达到目的。朱学由于南宋理宗的表扬，成为官方哲学。元代主要是朱学的势力。明代王守仁、湛若水是陆学的拥护者，明正德以后大盛，而王学传播尤广。所以讲到理学，从人物说是程、朱、陆、王之学；从时代说，往往宋明并提，称宋明理学。清中叶以后，理学由盛而衰。

理学酝酿于北宋，书院也始建于北宋；理学到南宋而大盛，书院也盛于南宋。明初理学无生气，书院也不振，到王守仁、湛若水四处讲理学，书院也随之大为发展。刘伯骥在《广东书院制度沿革》的绪论中说：“考宋、明理学所以特别发达，一方面固然因它本身价值有扩大的可能性，而另一方面还因为它有宣扬的凭借之所，足以养成风气。所以在清以前，书院之升降与理学升降是互为因果的。”

其实，宋代以后，一些学校也学理学。我国自汉代以来，从太学到郡县学，都学习儒经。唐代科举考试，有明经科，考的也是儒经。这种儒经是孔颖达的《五经正义》，颜师古的《五经定本》，基本上沿袭汉代经学而不是宋学的经学。北宋有较长的一段时期盛行王安石的《三经新义》。《三经新义》虽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经学，却不讲心性之学。程朱的理学，在宋代遭黜禁，到宁宗嘉泰二年（1202年）才弛了伪学党禁。在此以前，朱熹虽极力宣传他的理学体系，毕竟得不到官方的支持。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成为科举衡文标准，是在元代仁宗以后。所以，元初以前，理学并没有完全统治学校。不过明清两代的科举都沿用元制，明永乐年间又颁行了《性理大全》，理学确实成为学校和一部分书院所共同学习的课程。自元代起，书院已逐渐官学

化，清代的府、州、县书院，几乎与学校没有什么两样，都是应科举考试的准备场所，学的相同，是不足奇怪的，但这些应科举考试的理学，只是理学的大路货。从理学的专精部分看，研习的只有书院，而学校是不在内的。南宋的学术繁荣，有讲心性之学的书院，也有讲事功之学的书院。以讲心性之学的书院而论，陆九渊的书院就和朱熹的书院不同：一个发挥主观唯心主义理学的精微，一个讲述客观唯心主义理学的体系。朱熹的门徒很多，多立书院，传朱学。其中有谨守朱熹成说的，也有对朱学作进一步发挥的，像黄震、王应麟、何基、金履祥等人，有时所持的议论，竟与朱熹相牴牾。再说明代王守仁与湛若水都承陆学的统绪，但他们各有各的主张。王守仁的门徒也最多，各传王学，说法却不一样。王艮讲“百姓日用即道”，李材主止静，王畿一传再传至陶奭龄而走向狂禅，刘宗周救王学走向禅悟之病，立证人书院，主慎独，尚“意”而黜解悟，这些向专精方面发展的理学，学校里是不会讲的。所以提“书院传习理学”，是指理学专精方面说的。但如果说具有专门学性质的书院全部传习理学则是不可以的。因为有些具有专门学性质的书院，恰恰不传习理学，或主要不传习理学，甚至是反对心性之学的，而这些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又颇有地位，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也做过很大的贡献。如清代苏州的紫阳书院，扬州的梅花、安定书院，南京的钟山、惜阴书院，杭州的诂经精舍，广东的学海堂、菊坡、广雅书院，江阴的南菁书院等，它们主要讲习经史辞章，理学或不讲，或讲而不居重要地位。再如南宋的事功之学，包括陈亮的永康之学，薛季宣、陈傅良、叶适的永嘉之学，吕祖谦的婺学，也就是朱熹所痛恨的“浙学”，他们钻研经史，考订名物制度，尊重文献，主张实学实用，开物成务，又多长

于文学，所持议论，还有不少朴素唯物主义观点，是一个重要的学派。由于程朱理学从南宋理宗以后成为正统儒学，后世称述这个学派的人比较少。实际上，这个学派流传之远，是很有生命力的。由北山一派传至明初宋濂，一般说是朱学的传递，其实颇多浙学的成分，而黄宗羲、万斯同、万斯大、全祖望、章学诚的清代浙东之学，也承接南宋浙学的绪余。

三 明代书院由衰而兴

元朝末年，政治腐败，土地高度集中，统治阶级对农民剥削、压迫日益加深，更加天旱灾害频繁，广大农民流离失所，过着“剥树食其皮，掘草食其根”的悲惨生活，阶级矛盾迅速激化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。最后朱元璋利用农民起义的成果，推翻元朝统治，建立明朝。

朱元璋出身贫寒，虽不知书，但对文化教育却很重视。他一方面自己勤于学问，另一方面也注意罗致文人。早在称帝立国之前，他就留意文教，重用文士，关心人才的选拔和培养。明王朝建立后，对人才的选取更加重视，措施也更加有力。

明代洪武年间，不仅花费大量财力、物力和人力，创办南京国子监，还在地方府、州、县、卫所办了各级各类学校，如明太祖对礼部所说：“无有风雨霜露，无所不施，圣人之教，亦无往不行”（引自《明会要》25卷《学校上》）。与此同时，明统治者也注重科举。洪武四年二月开会试科，由明太祖亲制策问，及第者在奉天殿张挂黄榜，宣谕赐宴中书省，并即授予官职，这对于读书人，有很大的吸引力。

由于明初的几代帝王都把教育的重点放在鼓励荐举、兴办官学和提倡科举方面，对于书院未加重视，所以自洪武至成化，将近一百年间，书院一直处于沉寂状态。儒家学者多被吸收到官学讲学，读书人有多种途径获得仕进之机，对私人教学的书院兴趣不大，也造成了书院的沉寂。

明太祖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曾因元代之旧，立洙泗、尼山二书院，这不过和明初设学一样，只是开国时尊崇儒学的一种表示，并不真正重视，此后100年未见有任何倡导。自宋代起已负盛名的白鹿洞书院，经元末丧乱，殿堂斋舍周围树木杂草丛生，已无路通行，书院建筑仅存濯缨、枕流两个石桥，一片荒凉。

明代书院在成化（1465—1487年）之后才渐渐兴起，至嘉靖年间（1522—1566年）达到极盛。依近人统计，明代共建书院1239所，其中嘉靖时创立的最多，占总数的37.13%。明代书院由衰而兴的原因，主要是由于科举腐败，教育空疏，于是一批士大夫便纷纷兴复或创建书院，倡导讲学之风。

明代科举腐败，士子多心存侥幸，不肯读书。于是购买、钻营、怀挟、倩代、割卷、传递、顶名、冒籍等，科场作弊，相演成风。尤其到成化以后，科举独重八股，士子只读程墨房稿。

明代的官学受此影响逐步变成科举的附庸。国子监的学生，有的是岁贡生，“但取食廩年深者”，“只有资格，不讲学力”，年老体惫衰迟不振者十之八九；有的是纳费捐得的；有的是靠老子的地位得来的。此时已视地方官学为取得应试资格的场所，读书之事，已成具文。督学，也多玩忽职守，不尽其责，如此更助长了士子之心骛于奔趋而不务实学。

国学制度的破坏，科举的极大流弊，再加上残酷的剥削，造

成此时的农民起义不断发生。明朝统治者感到用程朱一套的办法来控制劳动人民的思想，太缓慢了，因此“破心中贼”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，被认定是快速办法而加以提倡。一些理学家为救治时弊，多立书院以讲学，于是书院逐渐兴盛。据《明史》所载，明代书院，有44所之多，包括：明道书院、金川书院、白沙书院、岳麓书院、鹿山书院、阳春书院等。有人根据各省地方志统计，明代书院还要更多，达到1239所，大大超过元代。

明代初100年间书院处于沉寂状态，成化以后渐渐兴起，嘉靖以后大盛，其直接原因是由于王守仁、湛若水等理学大师讲学的影响。王、湛等人讲学于书院，不仅使书院数量大增，而且继承和发扬了南宋时期书院的讲学之风，发展了书院的“讲会”制度，涌现出一批颇具特色的书院。王守仁（1472—1528年），字伯安，人们称他阳明先生。他从34岁起，就开始讲授儒家学说，前后共23年。王守仁28岁时就举进士。正德元年（1506年）34岁时，曾与湛若水定交，以倡明圣学为终身志愿，决心继承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陆九渊的思想。他历任刑部主事，庐陵知县、左金都御史、南京兵部尚书，被封为新建伯。他一方面是朝廷的重要官员，一方面又是有名学者，到处设书院讲学，影响很大。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王守仁被贬谪到贵州的龙场驿做驿丞，就在那里创龙冈书院，从事讲学活动。次年，又在贵阳的书院讲学，开始提倡知行合一学说。正德十三年（1518年），王守仁巡抚南赣、汀、漳，在江西修濂溪书院讲学，四方学者前来听讲，致使讲堂容纳不下。嘉靖三年（1524年），他在会稽山建立书院，亲临讲学，湖广、广东、直隶、南赣、安福、泰和等地来听讲者多达300人，《明史》记载：“正嘉之际，王